3 6-32 70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

成果题目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

成果形式 论 文

发表于何种报刊（包括日期与期别） 入选中央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收入4本论文集

本人在作品中承担的部分 全 部

申报类别 个 人

申报人（单位）（签名盖章） 熊宗仁

注：①申报类别指个人，联名或集体。

②作者联名的，在作者姓名一栏中需填写清楚。以单位署名的集体成果，作者姓名这一栏不填写。

③如被采纳或产生了经济社会效益的建议等，必须附上有关单位证明，并在申报理由栏写清楚。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熊宗仁	男	48		副研究员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民族：汉					

成果的主要内容及申报理由：本文首次把中国共产党发现和解决农民问题提高到犹如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一样，成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即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突破口。文章把70年来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五个突破口"、"六个结合"，是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提出了要实现小康和现代化必须解决农民、农业、农村中已出现的利弊相生的"五大趋势"，指出小康和现代化的基础是农民、农村的小康和现代化。得出了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日的结论。

本文写成于1991年4月下旬，其中的许多提法、观点和思路与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相一致。由于具有理论上的探索性、决策上的指导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获得了中央、省委、省政府及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论文被中央破例入选，作者应邀赴京开会。论文在贵州省和中国现代史学会召开的大会上推举大会发言，被收入4本论文集，4家刊物摘登、选载或介绍了观点，一家刊物特约改写成连载4期的专栏文章发表。以本文框架为思路设计并形成了中央国家机关5个部门领导参加、8个省协作、省委书记刘正威签字、省委盖章认可，省政府已下达专款8万元实施的综合性大课题。课题牵头单位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联合向全国征文，召开全国首次"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学术讨论会"，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本文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所提农民问题被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的最佳结合点。

社会评价及社会效益详见附件一至十一。

填报人签名盖章 熊宗仁

1992年7月7日

此项成果曾受过何种奖励	备注

贵州省社科联评奖办公室制

填报日期 1992 年 7 月 7 日

D422.7
2-3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

熊宗仁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91年7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总结我党70年来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经验，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农民问题的关系为主旨。农民问题的内涵，包括农业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和农民阶级的问题。

犹如马克思完成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一样，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成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的基石。农民问题，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突破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突破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破口，是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破口，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农民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共运实践的杰出典范。

自古以来，农民问题就是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中国农民问题的特殊性、严重性，是由于农民构成了中国基本国情的综合制约因素，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由"天然"向"必然"转化的环节，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任务，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方针、政策。党善于吸取国际共运和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也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

今天，中国农民身上既蕴藏着走向现代化的最深厚的潜在动力，又同时有一种影响广泛的堕力，他们既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已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但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农民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与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与科技的结合；与自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结合；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合等六方面的问题，以顺利实现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改革以来，农村和农民中已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历史大趋势已经开始，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利用，发展和巩固新型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丰富和发展我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

·熊宗仁·

犹如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和完成，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 一样，农民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从这里开始，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它是能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结果。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石，它能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等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和中心，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是连接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纽带。

农民，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又是最大的潜在的人力资源；农民，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主要对象，又是它的主要来源及最忠实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既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引导的对象，又是她的最深厚最广大的力量源泉。中国农民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小生产的落后性，但自古以来就富于创造性和斗争性，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有极大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和奉献精神。中国农民身上这种消极性与积极性、惰力与动力的矛盾交织，构成了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特殊重要性。当今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性转折的突破口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便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对一个以农业为命脉、以农民为主要国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关系不断发生变动，革命和反革命的营垒也经常发生分化的情况，要弄清革谁的命，怎样来进行革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谁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而明确。但在当时，马列的经典中找不到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照搬。中国共产党内在关于革命的领导权和寻找可信赖的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有三种主张：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忘记了农民；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主张，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一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强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必须结合起来。他还明确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标志，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党所采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观原因中，轻视农民，没有大力发动和依靠农民是最致命的。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挽救革命的种种努力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白色恐怖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家，顶住了来自敌人方面的和党内的压力，以宏大的政治毅力和卓越的理论勇气，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依靠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造成革命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形成了开辟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突破口。这种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②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尔后被王明左倾错误所断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科学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例证。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③

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其突破口和基础，是无产阶级教育、团结、依靠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和发展党以夺取政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其基础只能是农民问题的正确解决。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突破口是农民问题。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④。这里所指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个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在新中国诞生后，它就由一个理论问题变成了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实践上顺利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路线，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纲领，制定了稳步实现革命转变所应采取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在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变成了现实。农民完全站到了党和政府一边。他们恢复生产，稳定农村新秩序的能量充分发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有秩序地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调整工商业，建立国营经济领导等一系列工作才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前提。由于农民与工人结成了最广泛而牢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所以抗美援朝才有了坚强的后盾；而当资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时，我们党也能够顺利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短短三年时间，我们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由于满足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渴求，解决了他们跟谁走和怎样走的问题，我们党不仅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破口是农民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虽然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但其波及面之广、影响人数之众，是世界空前的。能否把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赎买的构想变成现实，在较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对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完成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同时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政治前提是社会稳定，小生产者不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后备军，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和后备军，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其经

济前提是国营经济有足够的强大实力，维持国计民生的农业稳定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和农业互助合作的萌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民族资产阶级孤立无援，最好和唯一现实的选择，只能是由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1951年9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一历史性文件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破口。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又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事实证明，由于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合理的步骤，着重引导五亿农民组织起来，在广大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对于观望、犹豫或抱抵触情绪的城乡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压力和引导动力。几乎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步，我国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

中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突破口是农民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至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粮食产量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他们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当时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我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时代与苏联和东欧当时的情况大不一样，要搞工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早在建国前，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就断然认为人口是中国“不堪负担的压力”，解决中国人吃饭的头等大事，“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⑤。其实，我们早在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基本成功地寻找到了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路子。此外，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还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工业发展的劳力、原料、资金及市场等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即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应放在哪里？从何处迈步？党又通过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找准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破口，明确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应以农业为基础，走我国自己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采取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在具体实践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早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已经出现的过急、过快、过粗的问题，不仅没能得到纠正，反而在1958年开始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加剧和扩大了。“浮夸风”、“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虽然党中央及时发觉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纠正，终究没能避免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不久的重大失误。这一失误的实质和最主要的方面，还是在农民问题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农民问题。

当我们克服人祸天灾所造成的一系列困难后，农村形势大大好转，国民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错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内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中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它的实施的突破口也是农民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城市围绕搞活企

业所进行的各种承包的全面改革。十年巨变，经济翻番，为实现本世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中国农民在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它把家庭承包这种经营形式引入集体经济，形成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适应了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结构；既给发达地区向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提供了自主权，又使不发达地区的脱贫工作有了内在的驱动力，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突破口。它的稳定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伟大成果。

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列宁在1919年曾向东方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⑥列宁的这一期望，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光辉历程中已经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列宁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⑦我们如果考虑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基本目标和根本标志是对农民的领导；十一亿多人口吃饭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村的稳定、农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农村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等等客观存在，然后认真领会和分析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基本立足点、基本对象和基本目标，都主要是靠解决农民问题或与农民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其前提和基础的，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丰富。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主要原则。建国以来我党一贯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充实的这些主要原则，不同程度都与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以之为基础，或以之为基本对象，或以之为前提条件，或与之有联系。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没有农民问题的正确解决和创造性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具体化为若干方面，但最突出、最根本、对中国最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农民问题。马列主义者最重视的是如何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民问题，使马列主义关于重视群众历史主动性的思想有了更丰富的理论层次和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

农民问题——历史、现实和未来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

自农民阶级产生以来，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其兴衰治乱，无一不与农民问题息息相关。进入近代，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一步一步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虽受到巨大冲击，但始终没能动摇以农业立国的基础。农民阶级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使中国久被侵略、屡遭劫掠而生命不息。依靠农民问题的正确解决而诞生的新中国，经过近42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业虽有了巨大发展，农业仍是国命所系，是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就决定了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共产党必须把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点放在农村，放在依靠和教育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身上。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宝库中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呢？

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是中国农民的强烈愿望，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民所难以比拟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根基，就是奠筑在农民的血汗和躯体之上的。进入近代，中国农民不仅要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到封建的族权、神权，农村妇女要加上夫权这一些并非完全属于阶级范畴的系统权力的支配。而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往往超过工人和贫农。天灾人祸、军阀混战和民族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或反革命战争的经济的、人力的负担，几乎都是转嫁在农民身上。中国农民素以吃苦耐劳著称，又富斗争精神和独立生存的能力，有极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渴求，能够接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秉赋及其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他们除了“血缘”上与工人阶级有天然的联系外，思想上也最易与工人阶级产生共鸣。这是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先决条件。

其次，在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用成功的经验同时也用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需要教育改造的对象的理论得以中国化，并使之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农民由“天然”的同盟军向“必然”的同盟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转换环节，成功地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付出惨重的代价，才形成、确立并成功地实践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⑧的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其中的主要经验概括起来有三：一是要用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看农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占农民人口70%以上的贫雇农，团结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中农（以后又从中农中将下中农化分出来作为依靠对象），调动他们参加反帝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克服他们的摇摆性。对占农村人口5%左右的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政策，利用其能参加反帝斗争的一分力量，使之在土地革命中保持中立，而不至于站到地主一边。就是对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不同时期也区别对待。在抗日战争中，改“没收”为“减租减息”，调动一部分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士绅拥护抗日的积极性，减少国共合作的阻力。二是在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不是生搬硬套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而是适时地把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引导向社会

主义。党采取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种过渡形式，避免了社会的过大震荡和工农之间的对立。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的改革中，党和工人阶级既看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又充分认识和肯定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互补互利的新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促进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和全社会对农民脱贫致富的扶持。中国农民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天然条件，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不通过教育灌输，会在农民中自发产生。因此，始终把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待。

再次，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总结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也善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自己解决农民问题的借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由于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使农民的经济政治状况有所改善，加之资产阶级、地主和天主教神甫的欺骗，加深了农民对工人的错觉和偏见，致使农民始终与巴黎公社处于隔阂和敌对之中。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在农民问题上的第一次沉痛教训。俄国十月革命由于得到农民的支持，迅速取得胜利，则又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而苏维埃国家被迫在经济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许多严重错误，特别是禁止农产品的商品流通，企图用“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作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农民产生了同工人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情绪。尔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着重解决工农关系，强调工农联盟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并给农民经济实惠和选择土地经营形式等权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正确的尝试，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之一。列宁逝世后，迫于客观条件，苏联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农民问题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始终没有解决好。直至今天，苏联也没能摆脱农业与工业不能协调发展的困扰。苏联的经验教训，无疑成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借鉴。

第四，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总结农民阶级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种革命斗争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总结的农民自发办成的14件大事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解决，便是从这14件大事的基础上起步、发展、丰富和创造出来的。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及农民问题在新时期应如何解决的问题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可归纳为六个结合：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使农民与社会主义结合；二是实行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农民与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三是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率，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农民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四是坚持科技兴农方针，普及和推广农业科技，解决农民与科技的结合；五是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面向农村，解决农民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自主结合；六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顺应农民经济自治后要求政治自治的历史趋势，解决农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合。这一切，使农村深化改革的路子越走越宽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农民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它的根据除了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当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外，还有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这一基本国情的各要素中，人口多，十一亿多人口，八亿多农民，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实行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农村，在农民身上；耕地少，世界农民中，每三个就有一个在中国。中国农民用只占世界耕地面积不到1／13的耕地，却养活了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5。这是奇迹，也实堪忧虑。中国的耕地几乎达到了负载的极限。如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扩大耕地面积，不靠农民靠谁？底子薄，主要指综合经济力的基础薄，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基础更薄，很大程度要受制于自然。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增加到13亿左右，若维持人均粮食400公斤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要提高到5200亿公斤。目前的家底与未来的需求实不容乐观。九十年代要实现农业由自给半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任务也十分艰巨。充实国民经济的家底，首先是充实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家底。主要的任务也落在八亿多农民身上。资源相对不足，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我国人口多，但人口素质低，人力资源相对匮乏。人力资源是由人的身体素质、知识、技能所构成。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国文盲半文盲的绝对人口约1.8亿，占世界文盲人口总数的1／4，且总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才5.5年，不到小学毕业。中国的文盲半文盲绝大多数在农村。1982年的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农业劳动者平均文化程度仅4.8年，而日本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程度1957年已达到11.7年。⑩要使中国数量巨大的人口变成丰富的人力资源，重点也在农民身上。中国总量居世界前列的物质资源优势，被人口过多所抵消，人均占有量就成了劣势。要改变这一基本国情所带来的不利方面，就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这一综合制约因素。

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国情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问题，而且还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哪一领域的现代化，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朝着现代化的目标的发展或变革。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主体，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切观念及设施，无不以人民群众为转移。中国人民的主体是农民，离开了他们，一切发展和变革都是空话。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系统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及配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根据中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虽已提出，但来不及也没有可能实践；列宁虽从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发展，但也没有来得及形成系统的理论与配套的实践经验的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仅有系统的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正在形成自己独创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十年改革的伟大胜利，也证明了这一以解决农民问题为突破口和基础的理论是科学的。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明确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始终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也是指导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针。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是从总结和推广农民创造的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的经营方式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建国以来的历史也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则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农民又是农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和最可宝贵的因素；同时，中国农民的现状却也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和制约因素。对此，中国共产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清醒的认识。党和国家把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作为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指出："解决十一亿人口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⑪这是对中国农业也是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高度概括。它标志着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八十年代以来农村改革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们欣喜地看到，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充分肯定和英明预见的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中国农村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大趋势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主要靠农民，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主要靠农民，中国已开始了"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士兵主要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他们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如不依靠农民，"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推广科技，所谓社会主义文艺，所谓爱国卫生，所谓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等等，离开了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⑫

九十年代，是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完成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的关键十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宏伟任务，正呼唤理论的跟进。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的理论也必然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经过党领导下的28年革命斗争的洗礼和41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锻炼的中国农民，已经显示和正在显示她们冲决小农经济罗网的伟力。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41年后，我国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同时，又是壮大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来源，以及中国农民阶级性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乃是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深化农村改革以及整个社会的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忽视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广大农民历来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者。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不断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⑬这是新形势下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和发展的基础，容不得半点的忽视。农村和农民中已经出现的新事物，为新形势下工农联盟的巩固注入了新的活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目前已拥有9200多万职工，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1990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创汇额已占国家外汇收入的21.6%，上缴税金已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4%。⑭许多新兴的小城镇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发

展，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农民对政策、对城市、对工业、对科技依赖性的增强，农产品商品化率在现有的60%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即将实现。目前，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潜在的失业大军，“两个人的活三个人干”。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有组织地进入乡镇企业或自发地脱离土地，成为城市劳动力的后备大军。这种忧喜掺半的现象，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一个征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农民，一批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农民，一批掌握了某种农业适用科技的农村专业户，他们依靠党的政策和个人的诚实劳动率先致富，并成为广大农民共同富裕，共奔小康的带头人。他们已经成为在中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开拓者。广大农村“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关系的确立，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工农业新型互补互促关系形成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制定了层层递进的“三部曲”的宏伟规划。要实现这一目标，基础是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阶级的现代化。中国农业、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也就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日。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

③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30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⑤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0页。

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页。

⑦《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

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2页。

⑩以上数据参见《人口：包袱与财富》，《瞭望》周刊1991年第13期。

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⑫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979页。

⑬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⑭参见《瞭望》周刊1991年第13期，第30页。

附件一.

熊宗仁 同志

所著论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

经评审确定为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特发此证

编号：008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领导小组

（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章）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第十六屆共產國際會議

第十六屆共產國際會議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
论文入选通知

熊宗仁 同志：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征文评选工作现已结束，您的应征论文《中国共产党人农民问题》经会议学术工作组评选，已获通过，准予提交会议，并邀请作者到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由于会议规模所限，每篇论文只能邀请一位作者到会，多人合作的文章，请作者自行商定一位代表出席会议，并请于5月25日前将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职务职称等报北京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

2、请您对论文做进一步加工和修改，仔细校对全文，尤其是引文、注释和标点。注释一律放在文末。修改后的文稿一般不要超过12000字。

3、~~如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未安排统一印刷，请与其联系。~~按照统一规格和式样自行印制论文380份，于6月15日前寄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通讯地址：北京1924信箱，邮码100091，电话：2581565或2581166转340。

4、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报到方法等容后通知。

筹备委员会学术工作组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代章）
1991年5月13日

附：学术工作组对论文的意见：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报 到 通 知

[illegible]同志：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定于6月27日至7月1日在北京举行，请您出席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6月26日全天为会议报到时间，请您持本通知和会议请柬、工作证件到北京国谊宾馆报到。请务必提前将抵京时所乘飞机航班或火车车次、抵达时间等，电告北京1924信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以便安排接站。（电话2581166转340或330）

提前抵京的代表请自行安排食宿。报到时可乘地铁在车公庄站（或乘102、103、114路电车在百万庄站）转26路汽车到郝家湾下车即可。国谊宾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1号，联系电话：总机8316611转学术讨论会会务组。

二、会议可为代表代购7月2日、3日返程火车票，需要者务请于6月22日前将订票单寄还。

购买飞机票的代表请于6月20日前通知我们，并准确注明购票人姓名、登机时所用身份证号码、预定返程时间、抵达港等项。

三、本通知限代表本人使用，未经会议同意不得擅自转让，因故不能到会者望提前通知我们。由于会议住宿床位较紧，代表的随行人员等请自行安排。

四、代表出席会议的交通费用，由所在单位报销。

此 致

敬 礼！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秘书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代章）
1991年6月1日

注：会议请柬因故推迟到6月10日左右发出，请注意查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